

# 吉川幸次郎著

## 「宋詩概說」簡評

龔鵬程

書評，可視為研究工作的具體成果之一，其功能除了區別妍蚩之外，尚希望能提供一些對問題較嚴飭精密的看法，替日後的討論警騷開街、搭橋設棧。本文亦不例外。我要評述的對象，事實上可能與目前整個宋詩研究態勢有關，但焦點僅專注在一冊外國人的著作上，書名「宋詩概說」，日本著名漢學者宿吉川幸次郎著，岩波書店印行，鄭清茂譯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六十六年四月初版。

據林文月女士說，本書是日本近十餘年來漢學研究迷惘中的產物，因舊式研究法無法接續，新方法又尚未產生，有關中國古籍的注解、翻譯、介紹性叢書，遂大量出籠了（詳中外文學十卷一期「日本漢學研究新動向簡介」）。這種情形，與我國現況亦極相似，不過吉川撰寫本書時並

不如此認為，他是以寫專題研究的方式來撰述宋詩的，計畫把此書收入他計畫中的中國文學史裏，結果却寫成這樣一部我們看來像介紹性的書籍，原因何在？

我想這是日本漢學研究的特性使然——高瀨武次郎在他所著「日本之陽明學」書中曾說：「玄妙精微之哲學，一通過日本學者之頭腦，直化爲淺近且便於實行；其抽象、純正、高尚之部份，則懷疑之、除去之，而不見其發達」，蔡仁厚「日本陽明學及其特色」一文也說：「日本學者對文獻之整理雖然用功甚勤，但其解釋是否恰當相應，則很難說。因爲這不是勤學的問題，而是解悟與識度的問題。義理思想的闡釋發明，日本學者既已自認非其所長，則有關哲學思想之研究，日本學者大概很難提供出有參考價值的著作」。詩，比哲學更爲精緻超妙，其情形亦復如此。但其研究固然傾向淺薄，却非毫無參考價值，因爲日本研究漢學注意面較廣、分科也較細，而且因文化和心理背景不同，許多我們習焉不察的事，他們都會產生興趣或疑問，不無可供參考反省之處，像本書在正文之後，附有年表、宋代詩人生忌日表、宋疆域圖等，其編排方式就非國內同類書籍所能及。

不但如此，我們試取此書與國內唯一的宋詩探究著作——胡雲翼「宋詩研究」——略作比較，即能發現吉川此書在研究態度上顯然優於胡書。胡氏的「研究」，能否稱爲學術研究，大有問題，譬如：「呸！他們的不懂得寫喜劇的艷情詩，猶之乎他們不喜歡作悲劇的宮怨閨怨詩一樣」（頁十）「宋代的人物、思想，無論政治家、軍人、學者、文學家，一個個都是很平常的」（頁五四）「此後詩壇的情形，我們可以閉著眼睛很容易想像得到」（頁一三五）……，不僅目迷青赤、味味溜渾，且充滿了不合事實的陳述和主觀強烈的愛憎，在矛盾與凌亂中，我們只看到作者聲嘶力竭的「宣傳」。吉川此書較能避免這類情緒干擾，又先天不受五四運動以來許多流行謬見的侵害，自然顯得較爲冷靜客觀。敘述雖嫌簡略凡淺，却無撫拾陳言、排比失序之弊，頗便初學。

兩書寫法大致相似，總敘厓略之後，立即排比列厓，以時代先後爲序，舉一二代表詩人選擇說明。但胡書包含面較廣，南北宋詩人補誌兩篇，幾乎搜羅了兩宋較重要的詩家，相形之下，吉川書便單薄了些，無法窺及宋代詩壇全貌。這其中，胡書較注意唐宋優劣及宋詩派別的問題，吉川幸次郎則著重於唐宋詩不同的表現手法和人生觀，兩種寫法短長恰好互補；談優劣是價值判斷的事，非歷史敘述所必須，且易爲個人愛憎所左右；僅區別唐宋差異，也很容易將宋詩內部的派別差異攪混了。如吉川書所述，宋詩具總理性、敘述性及生活性特徵，固然不錯，但這只是宋詩的一般通性，植基在這一般通性之上的各各殊相仍是面貌互異的，例如「以理爲詩」，蘇軾固不同於王安石，邵雍也不同於朱熹，但相對於唐詩而言，此數人却都有哲理議論的特色，因此我們在討論宋詩時，對同一特徵表現上的級距 (range)，就不能不予考慮。而這層考慮，自然會牽涉到宋代紛紜複雜的家數流派問題。吉川此書，旨在綜攝，故於此二點，幾乎完全忽略，以致兩宋詩人的面貌，在一個宋詩特色的大鍋蓋下匳匳不清，每個人看起來都差不多。謂余不信，請看：

「首先，他與蘇軾一樣」 「再者，這一點也與蘇軾的人生觀相同」 「足見蘇軾以來超越達觀的哲學，仍然爲他所繼承」，這，這居然是陸放翁；「黃庭堅的人生觀，與蘇軾的哲學頗爲相近」 「他與蘇軾一樣是感情中人」 「黃庭堅的命運也很像蘇軾」……，好了，我們不禁要問：山谷和放翁東坡究竟不同在哪兒？本書將他們混爲一談，然後下一斷案，曰：「宋詩最大的成就、或最突出的性質，就在擺脫了以悲哀爲主的抒情傳統，而首先完成這個任務的，却非等到蘇軾的出現不可」（頁一四四），據他說，東坡達觀的哲學思想，完成了上述任務，而宋朝哲學家如邵雍、程頤、朱熹的命題之一即是要恢復古代的樂觀主義（頁三六）。如此一來，東坡和洛閩理學家爭鬥的事實便完全泯滅了，我們固可原有作者在政治文化背景和哲學史上的孤陋，但站在詩家流行及作品分類的立場上，我們要稍示抗議，抗議他處理宋詩創作手法和思想型態時一鍋煮的作風。

這種作風，源自一個信念：相信宋詩最大的成就和最突出的性質，在於「悲哀的揚棄」。若說吉川此書唯一明顯的特色和目的，是要說明宋詩揚棄了悲哀，實不爲過；作者序文和書內每一段落均充份顯示了這一企圖，自信滿滿。然而，事實果真如此嗎？

造成這種印象，一方面是吉川讀詩不慎的誤解，一方面是對唐宋社會制度不够瞭解所致。前者如杜牧「但將酩酊酬佳節，不用登臨怨落暉，古往今來只如此，牛山何必獨沾衣」，明明是世情勘透後退一步的曠達，他却解析成無限絕望之延續；陳后山，巾歎更覺霜侵鬢，語妙何妨石作腸，落木無邊江不盡，此身此日更須忙」，明明是人生無盡願無盡的悲願之情，他却看成「新的愉快經驗總會再來」。幾乎在他所有比較唐宋詩例時，都有這類情形，究竟是解悟與識度有問題呢？還是成見錮障了他睿智的眼光呢？

至於後者，則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七早就說過：「唐人作詩，多言遣戍從軍之苦，而宋元以下無聞焉。蓋唐用府兵，兵卽取之於民，故有別離室家，遠罹鋒鏑及親朋送行，歷歷悲慘之情；宋明之師，或用召募、或用屯軍，出征臨戰，皆其身所熟習，而分所當爲者，故詩人亦不復爲哀苦之吟矣」，詩既爲社會現實之反映，社會制度不同，自不可能要求宋詩也要和唐詩一樣描寫閨怨征愁。但宋詩無閨怨征愁，是否就表示宋人人生觀中已揚棄了悲哀呢？歐陽修所說：「愁苦之言易好，歡愉之辭難工」，在宋代成了普遍的創作認知，即使兀傲如王安石，倡言「文章尤忌數悲哀」，也在哭梅聖俞詩中說：「詩人況又多窮愁，李杜亦不爲公侯；公窺阨窮以身投，坎軻坐老當誰尤」（餘詳張健中國文學批評論集頁廿三—九三），其餘可以想見。吉川書中一面說王安石對全部唐詩的抒情精神非常嚮往，一面却忽略了王荆公詩是宋詩中悲傷質素最少的，足見其所謂「悲哀之揚棄」在解釋宋詩時疲軟無力！

主要論點錯誤之外，本書在局部敘述中也常失足，如頁廿四說僧參寥是東坡詩弟子、頁卅九

說陳師道是東坡四大弟子，俱屬誤說。第一章論北宋初過渡期更是把西崑體絃在林逋王禹偁之前，這是延續吳之振宋詩鈔以來的謬見（王禹偁死於宋眞宗咸平三年，那時西崑體尚未出現哩），然而劉大杰蘇雪林胡雲翼等人也都如此，不能獨責吉川幸次郎，吉川寫作時的謙搗和誠懇仍是很可敬的。

書末跋尾中，作者自述研究宋詩已有十年，讀完了「宋詩鈔」及許多全集，「儘量根據原始資料引出一己的見解」，但因對佛道等哲學問題所知有限，可能會影響全書的完備，希望學術界對這本書作嚴厲的批判。——此一敘述，可謂自識冷暖，不必我再饒舌，我只想指出三點，以供今後續予研究者略作參考：(1)原始資料之掌握。吉川研究十年，對原始資料之掌握仍極粗疎，前舉論西崑事可見，我們國內的研究又如何呢？讀過全集或宋詩鈔者絕少，多是抄襲拼湊陳腔爛調與誤說俗見而已，宋代詩史已成了一片迷霧海。(2)對宋代社會、政治等制度環境應有充份的了解，例如談江西詩派而不知詩社的淵源內涵，論江湖詩案而不知書商與文化界關係，均不能得其真相。(3)對宋代哲學思想之態勢應相當熟悉，否則非但指鹿爲馬，抑且無法體味那深具總理性的宋詩。

吉川有個觀念相當值得重視，他說：「因爲詞的流行是個新起的現象，所以頗受近時文學史家的重視。但過度的重視却非避免不可。原則上宋朝韻文文學的主流，從頭至尾還是在詩，最重要的感情依然託之於詩，不託之於詞。這是宋代本身的意識，也是目前的客觀判斷」（頁十）。五四運動以後，宋詩研究至爲寂寥，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居然屏棄宋詩不錄，其餘可想而知。今天我們若都有吉川這樣的了解，再掌握以上幾點參考性原則，成績自不難突越前人。吉川此書本身雖無多大價值，但提供我們這一反省的機會仍是相當可貴的。